

迎接香港回归专栏

香港开埠以来英人经济与 华人经济的对比研究

李 一平

香港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神圣领土。1841年1月26日英国人义律率军武力侵占香港岛,翌年8月29日英方强迫满清政府签订《南京条约》,香港被英国侵占至今已150多年。回顾这段时间香港社会经济的发展历程,尤其是华人经济和英人经济的发展变化,对于我们理解香港的经济成就和它所引起的巨大影响是不无裨益的。

1951年5月后,美国操纵联合国对中国实行战略物资出口禁运,加上美国对中国实行全面禁运,使香港与中国的贸易剧减,但香港同中国的贸易仍然保持着一定的规模。1952年香港对中国的转口贸易总额为8860万美元,港产品对中国出口总额为240万美元。香港从中国进口总额为14530万美元。香港与内地贸易总额为23640万美元,香港贸易逆差为5420万美元。1953年香港对中国出口总额为9449万美元,香港对中国转口贸易额为9220万美元,港产品对中国出口总额为15000万美元,香港与中国贸易总额为24460万美元,香港贸易逆差为5540万美元。这种状况,一直维持到70年代初期,只不过双边贸易额每年都有所增长。可能因为香港在对中国贸易中的这种作用吧,西方把香港称为“东方的柏林”。总之,由于英国对华贸易在1951年5月以后,实行两面政策,追随美国对中国实行战略物资的出口禁运,损害了香港与中国的贸易。但如前所述,香港的生存与发展离不开与中国的贸易,英国为了自身利益,也希望维持一定规模的香港与中国的贸易。这样,尽管在冷战高峰时期,香港与中国的贸易仍然没有中断。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香港由于其特殊的历史地位,为我国打破以美帝国主义为首的西方国家的经济封锁,作为我国进出口的桥梁对我国发展对外贸易、恢复国民经济作出了重要贡献。其历史功绩永放光芒。

回顾这一段历史,我们可以得出一些经验教训,即国际贸易是双边的、互利的。任何霸权主义以“封锁”、“禁运”、“经济制裁”为大棒企图达到某种政治目的和干涉它国内政的做法都是行不通的,注定要失败的。

[本文作者李世安,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教授,北京100872]

1836 年在华英商的喉舌《广东记录报》(Canton Register) 对英国占领香港是这样说的: “如果狮子(指英国——引者注) 的脚爪准备攫取中国南方一块土地, 那就选择香港吧! 只要狮子宣布保证香港为自由港, 它在十年内就会成为好望角以东最大的商业中心。”^① 这是当时英国东方商人的最大愿望。这一愿望后来果然实现了。在港英政府的自由港政策和华人在各个方面的巨大贡献中, 香港成为英国向中国及远东地区倾销工业品和获取原材料的重要转口贸易港。从 1841 年到 20 世纪 50 年代初, 是香港经济历程中的转口贸易港时期。

在这 110 年的转口贸易港时期, 香港经济主要就是英人经济从小到大和华人经济从无到有, 二者此消彼长, 不断发展壮大的过程。随着英人经济和华人经济的变化发展, 我们可将整个转口贸易港时期大致划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 1841 年至 1898 年

1841 年 1 月英国武力占领香港, 不到半年即于 6 月 7 日宣布香港为自由港。这是一项极其重要的政策。它所依据的自由贸易原则, 在资本主义上升时期极大促进了英国的对外经济扩展, 此时对促进香港经济中的英人经济也一直起着重要的作用。中英《南京条约》签订后, 英国人对于向中国倾销工业品抱着很大的奢望。璞鼎查曾经说过: “倾尽兰开夏全部工厂出产也不够供给中国一省的衣料。”^② 英国人低估了中国农业、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的自然经济结构对舶来品的顽强抵抗力, 对两国贸易的前景过于乐观。他们的盲目输出与推销在短时期内未能克服中国小农经济的顽强抵抗, 造成大量商品积压。加之 1843 年下半年中国沿海五口陆续通商, 香港的英人经济地位受到冲击。到 1843 年底, 香港仅有 12 家规模较大的和 10 家规模较小的英国商行、6 家印度商行, 还有来自新南威尔士寻求发财致富的一批商人。^③

但是, 香港贸易中的非正常贸易发展迅速, 鸦片走私和苦力贸易成为英商在两次鸦片战争之间的主要经济活动。其中, 和第一次鸦片战争前不同的是, 香港已成为鸦片走私的一个中心。据统计, 19 世纪 40 年代后半期从印度运来中国的鸦片有四分之三是经香港转销的。1840—1860 年, 尤其是 1850—1860 年间, 输入中国鸦片的数量较之战前有大幅度的增长, 香港成为鸦片走私的巢穴和贮存、转运中心, 这个地位前后保持达 30 年之久。^④ 其中做得最大和获利最

① 《时代》周刊 (Time), 1982 年 10 月 11 日。

② T. R. 巴尼斯特: 《834—1881 年的中国对外贸易史》(T. R. Barnest, A History of the External Trade of China, 1834_1881), 伦敦 1932 年版, 第 64 页。

③ C. N. 克里斯威尔: 《饮班: 香港商业大王》(C. N. Crisswell, The Taipans, Hong kong's Merchant Princes), 香港 1982 年版, 第 102 页。

④ 费正清: 《中国沿海的贸易与外交 (1842—1854)》(J. K. Fairbank, Trade and Diplomacy on the China Coast, 1842_1854), 第 1 卷, 斯坦福 1953 年版, 第 150 页。

多的是英商颠地洋行和怡和洋行。^①

两次鸦片战争期间英人经济的另一个主要内容是英商从事苦力贸易。这是19世纪中国劳工出洋的一种特有现象,主要采取‘契约劳工’形式。香港规定任何人出洋均有‘不受限制’的自由,加以香港英美商船云集,航运方便,因此去美澳两洲的中国苦力集中于香港,遂成为苦力贸易的中心。^②

据香港船政厅报告,仅1854年11月1日到1855年9月30日不到一年的时间内,报关登载的苦力船有128艘,其中英国占64艘。^③在1847—1857年的10年间,运载华人从香港前往古巴的英国航船就有26艘,共载9600多人。^④在这项苦力贸易中,英国商人获得惊人的暴利。据统计,1851—1875年的25年间,仅贩运华工至美洲各地的私人商行所获暴利达8400万元。^⑤

鸦片贸易和苦力贸易是香港英人经济在40年代末起发展的两个重要的因素。

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中国被迫开放更多的沿海口岸和部分沿江口岸。英国又于1860年割占南九龙,将港九间的广阔水域全部置于自己的占领之下,这些对于香港的转口贸易港地位是至关重要的。1869年苏伊士运河开通,缩短了欧洲与香港的航线,1871年欧洲有线电报直通香港,更加密切了香港与世界各地的关系,这就进一步对香港的转口贸易港地位的确立产生了重大影响。

首先,鸦片贸易和苦力贸易的巨利带动起来的航运业成为英人经济发展的标志。1854—1859年的五年间,香港的远洋航运平均每年增加船只487艘,增加吨位251350吨,年增长率为68%。^⑥19世纪60年代起,以香港为主要基地经营我国沿海、远洋及内河航运的外国轮船公司达13家,其中最大的3家中有2家是老牌英商洋行,即太古和怡和。太古在1874—1894年公司成立的最初20年间,它的船只吨位从6艘10618吨增至29艘34543吨。^⑦

到19世纪末,香港已成为中国内河、沿海航运中心和远洋航运中心、四通八达的交通枢纽、世界的重要港口。1900年,英国在香港总的航运业利益中占65%,仍居领先地位。

19世纪60年代后香港英人经济发展的另一个重要标志是金融业的扩展。1845年,适应英国资本家扩大中国市场的需要,香港成立了第一家现代银行—丽如银行。1865年,汇丰银行正式在港成立,这是总行设在中国的第一家银行。该行创办初期包括有英、美、德、印等国股份,但

① 勒费窝:《晚清西人在华企业:1842—1895年怡和洋行活动概述》(E. Le Fevour, Western Enterprise in Late Ching China, A Selective Survey of Jardine, Matheson & Company's Operations, 1842—1895), 哈佛1970年版,第29、48、166页。

② 卫三畏:《中国商务手册》(Williams, S. Wells, The Chinese Commercial Guide), 香港1963年第4版,第220页。

③ 巴斯:《苦力:美国华人史(1850—1870)》(A History of the Chinese in the United States, 1850—1870), 哈佛1964年版,第62页。

④ 费正清:《中国沿海的贸易与外交(1842—1854)》第1卷,第236—237页。

⑤ 陈翰笙主编:《华工出国史料》第4辑,第244页,中华书局1985年版。

⑥ 欧德理:《欧西于中土:从初期到1882年的香港历史》(E. J. Eitel, Europe in China, the History of Hong Kong from the Beginning to the Year 1882), 香港1895年版,第344—345页。

⑦ 汪敬虞:《十九世纪西方资本主义对中国的经济侵略》,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70—274页。

主要的投资和创办人则是在远东经营多年的英国大洋行。中间在港开设的银行还有有利、呵加刺、汇川、汇隆、利申、利华、渣打等 12 家银行。在 19 世纪最后二三十年中,汇丰银行发展成为在华外国银行中实力最雄厚的一家。它的迅速崛起,集中反映了英国以香港为桥头堡向中国大陆进行经济扩张的强大势头。据《中国近代经济史》,在 1874—1892 年间,汇丰银行的发钞额“增长了 3 倍多。汇丰银行的资产总值由 1870 年的 3805.3 万港元上升到 1890 年的 14968.6 万港元,即 20 多年内增加了将近 3 倍,而同时期内,它的存款则由 939.9 万港元上升到 10311.3 万港元,即增加了 10 多倍。这样,汇丰银行终于成为外国银行在中国金融市场上的最大势力,亦即控制中国金融市场的最大势力。”^① 汇丰等银行还掌握了中国出口商品价格的控制权,并且取代洋行成为对进出口商人的最大放款者。金融界的支持对香港的转口贸易的兴盛起着越来越大的作用。^② 洋行与金融资本相结合,开始在香港形成新的财阀。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香港较大的企业,如造船、电力、煤气、制糖、水泥等,都控制在以英商为首的少数大洋行手中。其中英商主要有怡和、太古、沙逊、泰和、仁记等。以怡和洋行为例,除继续经营进出口代理业务外,它还拥有香港火险公司、香港黄埔船坞公司、怡和轮船公司、中华火车糖局、怡和码头、香港置地公司、香港电力公司、香港电车公司、香港九龙码头仓栈公司等 20 余家。此外,怡和洋行还积极从事对华政府贷款。

可见,在 19 世纪结束前,香港的转口贸易港地位已经完全确立,并可称极盛。其主要标志为:香港在中国贸易总额中的比重增加。1870 年为 24%,至 1887 年超过 40%,由此至 1903 年均均在 40% 以上;^③ 香港进出港船数和吨位持续增加。1870 年进出港船只吨位为 2640347 吨,1900 年增至 14022167 吨;^④ 在英国对华输出中,到 80 年代末,英国对华输出几近一半是经香港的,香港成为英国对华输出的最重要基地。

而英人经济借助于港英殖民政府的种种特权,在香港经济活动中占据绝对优势,控制着香港的经济命脉,为 20 世纪以后英国保持在香港经济中的优势地位奠定了基础。

在这一时期,华人经济亦开始兴起。

19 世纪 40 年代的华商,绝大多数来自香港附近的广东沿海各县和澳门地区,他们以当地居民为主要销售对象,按中国人的传统方式经销日用百货等小商品。据不完全统计,1845 年秋维多利亚城有华人商铺 388 家,涉及 59 个行业种类。^⑤

50 年代后,国内外形势发生很大变化。大批内地居民移居香港,港岛人口自 1847 年的 2.4 万人激增至 1860 年的 9.5 万人。又因美国和澳洲发现金矿,中国内地经由香港前往新、旧金山的人数每年均达数万人;加上亚太地区,许多国家和地区的开放,香港的航运与贸易迅速发展,一些华人发展旅馆等行业,为来往于中国内地和美洲等海外地区的华人提供服务。另一些华人

① 严中平主编:《中国近代经济史(1840—1894)》下册,人民出版社 1989 年版,第 1078 页。

② 汪敬虞:《十九世纪西方资本主义对中国的经济侵略》,第 145—166 页。

③ 横山昭市:《香港工业化的研究》,东京大明堂 1969 年版,第 83 页。

④ 安德葛编:《东方转口贸易港:香港史资料集》,(G. B. Endacott: An Eastern Entrepot, A Collection of Documents Illustrating the History of Hong Kong),伦敦 1965 年版第 133 页。

⑤ 《1846 年香港年鉴及行名录》(The Hong Kong Almanack and Directory for 1846),《德臣西报》馆 1846 年印制,第

为适应海外华侨社会的需要,开始从事转口生意,横贯东西方向的“金山庄”和沟通南北交往的商行——“南北行”应运而生。华北、华中等地区出产的药材、花生、大豆、丝绸等中国内地的土特产与南洋等地的珠宝、香料、海产、大米、白糖、木材等,大多经由香港进行转口贸易。1860年,进出香港船只达到2888艘,总载重量达1555645吨。华商很快便掌握了香港贸易额的四分之一以上。行商南北行、金山庄的相继崛起,是这一时期华人经济实力增长的重要标志。1858年这类行商有35家,1859年增至65家,1860年达77家,两年间增加一倍多。经过60年代的经济不景气后,60年代后期开始回升,1870年行商增至113家。70年代中期,华人经济再呈迅速增长趋势。详见下表:^①

年 度	项 目	行商	零售商	米行	花纱	疋头	洋货	茶叶
1876		215	287	95	38	78	167	26
1881		393	2377	128	58	109	191	51

华商的发展,也带动了香港华人金融机构的出现和发展,主要有广东人开设的银号,经营汇兑业务,其中历史较久、影响较大的有瑞吉、邓天福和昌记等数家。

随着经济实力的增长,到70年代末80年代初,华人在经营转口贸易等方面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成就,华人社会的经济状况发生了明显变化。据官方统计,1855年末,香港个人交纳地税10英镑以上者141人,其中华人42人、英人69人,华人占交纳总数的29.8%;其中交纳40英镑以上的大户88人,华人18人、英人54人,华人占交纳总数的20.4%。^②1880年港督轩尼诗曾宣布:“华人已成为香港最大的业主,香港外国银行发行的通货极大部分掌握在华人手中,香港政府的税收有90%来自华人;1882年他又指出,香港每季纳地税1000元的业主有18人,除怡和洋行一家外,其余17人均为华人。”^③华人经济势力的不断壮大,要求建立统一的华商组织的呼声日高,1896年香港成立了第一个华商社团——中华会馆(现今“香港中华总商会”前身),这标志着华商已经在香港形成为一支在经济、政治上不可忽视的力量。时人指出:“昔之华商多仰西方之鼻息”,“近十年以来,华商之利日赢,而西商之利有所旁分矣”;“凡昔日西商所经营而擘画者,今华商渐起而预其间。”^④1894年8月23日,英国殖民大臣里本曾对港督罗便臣说:“在英国政府保护下香港已变成一个华人社会而不是英人社会……而华人居留地从来是香港繁荣的一个主要力量。”^⑤这表明,华人经济在香港经济中的作用愈来愈大。他们不仅是英商的贸易伙伴,而且已共同成为香港经济的主要组成部分。

① 余绳武、刘存宽主编:《十九世纪的香港》,中华书局,1994年版,第370页。

② 余绳武、刘存宽主编:《十九世纪的香港》第371—372页。

③ 安德葛:《香港政府与人民(1841—1962)》(Government and People in Hong Kong),香港大学1964年版,第92页。

④ 王韬:《园文录外编》卷4,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91—92页。

⑤ 安德葛:《香港史》(A History of Hong Kong),牛津大学1958年版,第215页。

第二阶段: 1900 年至 50 年代初

19 世纪末, 受资本主义经济政治发展不平衡规律的影响, 英国在对华贸易上的绝对优势开始动摇。甲午战争后, 帝国主义对华经济侵入的方式发生变化, 列强竞相输出资本, 加紧控制中国经济命脉。它们之间的矛盾和角逐日趋尖锐, 由于美、日对华的经济扩张和上海、天津、大连的进一步崛起, 香港的转口贸易开始削弱。其中中国贸易总额中所占比重自 1904 年起逐年减少, 1911 年更跌至 30% 以下。与此同时, 香港作为英、中之间的转口港, 其地位日趋下降。1889 年英对华出口额中, 香港几乎占了一半, 到 1904—1913 年平均每年仅为 22%。^① 不过, 此时是贸易份额的相对消长, 贸易和航运的绝对数字还是缓慢增加的。

1914—1918 年爆发了第一次世界大战, 大战四年中, 香港的转口贸易经济大体处于停滞状态, 并略有下降。然而, 港岛英人的修造船却利用欧美船因战争而减少的空隙大力发展, 太古、黄埔以及海军船坞, 相继进入修、造船的“黄金时代”。

一次大战后最初几年, 香港利用战后初期欧洲工商业凋零的机会, 转口贸易有过短暂繁荣。但终因英国地位进一步削弱, 在中国市场上落后于日本、美国, 加上 20 年代初期前后中国人民频繁掀起反帝斗争高潮, 以转口贸易为主的英人经济屡遭打击。英商意欲向东南亚开辟新的市场, 终因 20 年代末 30 年代初的世界经济危机的严重影响, 各地纷纷筑起关税壁垒, 致使开辟新市场努力收效甚微。港元剧烈贬值, 金融业动荡。贸易额大幅下降, 1933 年香港对外贸易额尚不到 1920 年数额的 30%。香港处于一片萧条之中。

为此, 港英政府于 1934 年任命了一个委员会, 负责对香港贸易不景气的原因、影响进行考察并提出解决办法。此前 1932 年在加拿大渥太华会议上成立了英联邦特惠税协定, 香港于 1934 年加入, 这对香港工业发展是一个刺激。香港市政建设在此期有了进一步发展, 英商“启德投资公司”在九龙湾北岸展开大规模填海工程, 在红磡海滨兴建新的发电厂, 在九龙半岛新开 3 家公共汽车公司。同时英商还先后投资发展了一些为城市经济和生活服务的工业, 如纺织厂、面粉厂、水泥厂、酒厂、糖厂, 以及为航运服务的修造船、码头、仓库等部门, 城市交通和住宅建设都有了新的发展。1936—1940 年间, 香港工业产品出口额激增 6.8 倍, 在出口总额中的比重从 3.1% 升为 12.1%。^②

1941 年 12 月 25 日日军攻占香港, 实施野蛮的法西斯统治, 整个香港的外贸处于停顿状态, 工业大部分被毁。1945 年 8 月日本投降。战后英国卷土重来, 经济上首先致力恢复转口贸易。战后百废待兴, 需求旺盛, 贸易迅速繁荣, 到 1948 年香港对外贸易额达 36.6 亿元, 比 1939 年增长 166%。

1949 年 10 月 1 日新中国成立, 在港英商迅速成为新中国与外界进行贸易的中介。1950 年香港外贸总额超过 75 亿港元, 1951 年更达到空前的 93.02 亿港元, 其中与中国内地贸易占香港贸易总额的 26.5%, 达 24.67 亿港元, 居第一位。转口贸易繁荣, 也促进了英人经济中金融、航运和工业的复苏与发展。但是, 1950 年朝鲜战争爆发以后, 帝国主义国家全面对华禁运。战后刚开始复兴的香港经济迅速滑坡, 1952 年的外贸总值急剧下降到 66.78 亿港元, 比上一年

^① 伽尔:《英国在远东的经济利益》(British Economic Interests in the Far East), 伦敦 1943 年版, 第 52 页。

^② 小椋广胜:《香港》, 岩波书店 1942 年版, 第 115—114 页。

锐减 26.25 亿港元, 1954 年更减至 54.52 亿港元。香港经济面临着困境, 英人经济同样如此。

这一时期的华人经济, 由于整个 20 世纪的前半期, 是中国政局动荡和战乱频仍的时期, 因香港的地位特殊, 内地与南洋资金劳动力进出频繁。内地资金之流入香港, 主要是邻近省份的地主和城市资本家、商人。南洋等地资金有相当部分是华侨汇款回国, 以香港作中转地, 也有在海外经营成功的工商界人士在香港投资, 如永安集团(澳洲华侨资本)、胡文华家族(缅甸华侨资本)等, 他们很快就融入香港当地华人经济。

1937 年中日战争爆发后, 随着日军侵占我国, 许多工厂迁来香港, 资金和人力也大量流入香港, 乘日本工业部分转向战时体制退出市场之机, 华人工业为主体的香港工商业发展出现一个高潮。

二次大战后, 尤其是新中国成立前后, 内地又有大批资本——其中以上海和江浙轻纺工业资本为主——和大批工商界人士及具有经营、技术才能的移民从内地流入香港, 成为 50 年代初香港华人经济活动的重要补充, 并为未来香港经济的工业化带来了新的基础。

综上所述, 从 19 世纪 40 年代至 20 世纪 50 年代, 英人经济和华人经济的发展是各有特点。英人经济发展过程的主要特点是:

第一, 早期英人经济的殖民性。香港最初的资本从英商本国或别地移植过来的。它得到港英殖民政府的支持, 享有某些特权; 同时又直接为殖民者及其宗主国利益服务。另一方面, 它同当时世界上最发达经济相联系, 带入西方先进的科技与管理经验, 促进了香港资本主义经济的起步与发展。

第二, 早期英人经济具有资本原始积累的特性。鸦片贸易和苦力贸易是当时英人经济活动的核心, 英商把新的利润再投资于丝、茶贸易和航运、金融等业, 明显具有资本原始积累的特点。

第三, 英人经济从商品输出到资本输出。19 世纪后期和 20 世纪初期, 面对激烈竞争, 英商改变经营方针与方向, 投资结构逐渐由产品交易转向生产性投资及借贷资本输出, 洋行转变为新的财阀。

第四, 英人经济占有主导地位, 控制香港经济命脉。汇丰、怡和等大银行大洋行控制了香港的财政金融、交通运输和其他公用事业。

与之相应, 华人经济也表现出自身的个性:

其一, 转口贸易是华人经济的支柱。华人此期主要经营进出口委托业务, 开始时转运国内大江以南及华北两线货物, 后扩展至澳洲、美洲南北半球, 在不太长的时期内积累了大量财富, 成为华商的核心力量。其经营的进退与世界市场的盛衰、转口贸易的升降, 关系殊为密切。

其二, 香港是列强对华经济扩张的基地, 华人经济是国际资本的附属物, 具有殖民地特性。他们或在两次鸦片战争中因替英军提供后勤服务而暴富, 或因贩运华工、包卖鸦片而发家, 或者直接是外资向中国内地扩张的传导人——买办, 并有一个由完全依附到逐步独自发展、但仍与英人经济密切联系的过程。这也是华人经济在殖民地香港谋生存求发展必由的途径。

其三, 华人经济大多属中小资本, 具有灵活、‘好调头’的特性, 但遇到经济危机等大风浪时难于抗衡。

二

从 20 世纪 50 年代初期到 90 年代, 是香港经济发展进程中的现代化时期。

到 1992 年, 香港生产总值达 7425.8 亿港元, 人均生产总值为 12.78 万港元, 分别比 1950 年的 31.5 亿港元和 1408 港元增长 235.7 倍和 90.8 倍; 对外贸易总值达 2479 亿美元,^① 位居世界第 10 名。金融业在 1992 年总资产额达 56160 亿港元, 存款额达 14440 亿港元,^② 外汇日成交额为 610 亿美元, 香港成为世界三大金融中心之一。香港已从一个转口港发展成为一个以加工业为基础、并以对外贸易为主导的现代化工商城市。

这个现代化时期, 是香港实现以工业化和经济多元化、经济转型为主要内容的历程。在这个时期, 英人经济以英资财团为核心, 继续向前发展; 华人经济则以华人资本崛起、华资财团形成, 进而与英资财团抗衡, 一争高下。这是香港社会经济发展中的重大变化。

在这一时期, 由于战后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刚开始进入一个长达 20 年大发展的所谓“黄金时代”, 有利的国际环境给英人经济在香港的新一轮发展提供了必要的前提条件。与此同时, 港英政府坚持“自由港”政策, 英资中的汇丰和渣打银行并采取了一系列的较为明智的措施, 为香港的工业发展包括纺织、成衣、金属制品、塑料、化学工业、船舶修造、饮料和香烟等提供了相当数量的贷款, 以支持“出口导向”的经济发展战略。1950 年汇丰的税后盈利仅 1720 万港元, 到 1991 年度已达到 67.7 亿港元, 其盈利的 85% 来自于香港。

长期以来, 英人经济控制着香港的经济命脉, 它控制了金融、保险、地产、通讯和交通等公用事业, 在对外贸易、制造业、航运、航空和旅游等方面也有雄厚的实力。经过最近 40 多年的发展, 英人经济在港拥有 7 大财团: 香港上海汇丰银行、怡和、嘉道理、英之杰、和记黄埔、会德丰等财团。

英人经济在香港最大的优势在金融财务。英资汇丰和渣打银行不仅享有纸币发行特权, 而且拥有近 500 家分行, 占全港银行分行 1/3 以上。存贷业务占 6—7 成。据汇丰银行估计, 英商经营香港半数以上的保险业务。

在地产方面, 英资地产公司拥有香港大批地产物业。其中怡和财团控制的香港置地公司, 在港岛最繁盛的中心商业区拥有商厦 10 多座, 是香港最有势力的商业、住宅和工业楼宇管理公司之一。

交通运输及其他公用事业, 80 年代以前, 英人经济控制及经营的有电报、电话、电力(两家公司)、煤气、电车、轮渡(一家公司)、码头(两家公司)、海底隧道和山顶缆车等。近十几年来, 华资接手经营了电力、码头、轮渡公司的各一家以及其他企业。但英资对通讯业控制进一步加强。英国大东电报公司通过属下的香港大东电报局和香港电话公司垄断了香港通讯服务。1988 年, 二者合并成为香港电讯公司, 第二年该公司股票市值达 70.05 亿美元。

此外, 通过在香港上市公司总市值中所占比重, 也可看出英人经济在香港经济中的地位,

① 《香港的现状》,《东京新闻》,1993 年 10 月 31 日。

② 香港《快报》,1993 年 10 月 17 日。

1985年底香港上市公司总市值额,达到2623亿港元,其中10大上市公司总市值约占54.39%。在这10大公司中,仍有一半以上为英资控制。据估计,目前英资拥有的证券,约占总市值的30%左右。

为香港前途问题困扰,部分英资在70年代后按照“获利在港、投资在外”的做法,转移投资,不能抓住70年代大发展的良机,还有些经营不善。因而在80年代出现多起争夺英资公司控股权的收购战。英人经济地位开始下降。进入90年代,这种趋势仍在加剧。

在这一时期,华商和华人经济在香港工业化中起到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50年代初,香港面临着“不出口即衰亡”的严峻形势。据经济学者估计,如果制造业得不到发展,1952—1954年间香港“国民收入”可能会减少1/3以上。^①形势所迫,香港人唯有以劳力密集型的纺织、成衣业为先导,奠定出口加工工业的基础。据估计,1946—1950年间,以商品、有价证券、黄金和外汇形式从中国大陆流入香港的资金不下5亿美元。在1949年第一季度申办的工厂中,约有60%是从内地迁港的。这些内地迁港工业包括纺织、橡胶、五金、火柴等,对于香港工业的重建和发展有着重要影响。50年代中期,棉纺织业比初期有了成倍增长。1960年香港有纺纱厂30家,织布厂300多家,制衣厂689家,^②其中大多数为华人经营。纺织、成衣占香港制造业产品出口的52.9%,开始形成以轻纺工业为主体的现代工业体系。在50年代末香港出口总值中,本地制造业产品出口值由1947年的10%上升到1959年的70%。实现了对香港日后起飞十分重要的由转口贸易港到工业城市的重大转变。

华资在50年代经营的企业规模都较小,它们一般把取得的利润再投资扩大再生产。到了60年代中期,由于中国内地正值十年动乱,英资对投资地产业持审慎态度,并采取资金分散的做法。而此时正值香港工业迅速增长、人口不断增加,对土地的需求增加,从而刺激了房地产业的大发展,一些华人工业资本看准时机,转而投入房地产业,在1967—1968年、1974—1975年房地产市场低潮,斥巨资收购大量低价地皮,在1976年房地产市场转活后,利润大幅度上升。形成了长江实业、新鸿基、恒基、新世界等华资地产大王。

与此同时,华资还利用60年代日本经济起飞的机遇,运用善于管理和船舶经营成本低的优势,打入日本航运市场。到70年代中期,香港船队一跃而成为世界最大的独立商船队,形成了象包玉刚那样的华人航运巨子。

在香港的自由经济制度下,变幻莫测的股票交易也为华资的崛起与分化提供了有利条件。从这一时期股市的发展来看,华人经济的总趋势是在持续稳定地增长。

进入80年代以来,华人企业家李嘉诚先后收购了英资财团属下的和黄集团及港灯集团公司,包玉刚先后收购了九龙仓集团、会德丰集团和港龙公司等,显示出香港华人经济的实力与规模,已发展到可与英人经济相抗衡的程度。目前的华资大财团的经营范围几乎囊括香港经济的主要行业,尤以地产、金融财务、旅游酒店、航运等第三产业为主,成为综合性的多元化企业集团。

进入90年代,华人经济进一步发展,而传统的英人经济则逐渐退却。1992年6月30日香港10大家族财团控制上市公司共占总上市市值9491.72亿港元的52.59%,其中华资占

^① 乔:《香港成长的两难之境》(Joe, Hong Kong Dilemmas of Growth),澳大利亚国立大学1980年版,第161—164页。

^② 香港民政署:《1979年经济多元化咨询委员会报告书》。

31.74%，英资占20.85%。英资集团所占比例较之80年代进一步下降，加上非家族的汇丰集团和大东电报等，英资仍略占优势。可见此时的华资与英资经济已呈现此长彼消局面。

华人经济与英人经济再加上来自中国内地的中资，在香港已成三足鼎立之势，这是香港社会经济发展中的重大转折点，不仅对于过渡期的香港经济，而且对于香港回归祖国后的经济发展，对于150多年来的香港历史都有着重要的意义。

50年代以来现代化时期的英人经济和华人经济，经历了一个新的演变过程，表现出不同与转口港时期的特点。其表现是：

第一，英人经济仍与殖民统治相联系，但只随着经济的发展尤其是资本国际化发展，这种联系已相对减弱。70年代以来尤其进入过渡期后，英资同殖民统治联系更进一步淡化，而国际化步伐加快，以便为九七以后准备退路。汇丰和怡和的转移投资、迁往海外就是例证。

第二，英人经济在努力控制香港经济特别是一些关键部门时，鼓励多国多方资本进入，以保持有限的英资垄断与广泛自由竞争并存的态势。英资汇丰银行能够左右香港金融市场，但也得面对众多同行的竞争。

第三，英人经济同港府关系密切，对港府政策有很大影响力。汇丰、怡和、太古等英人经济的巨头，直接影响政府的重要决策与措施。因此，香港人曾说：“统治香港的是汇丰、怡和、马会和港督。”^①

华人经济在香港现代化时期呈现如下特点：

第一，依靠中小企业，从制造业起家，通过航运业与房地产业在短期内迅速崛起。华人经济开始都是小本经营，无论是转口贸易、本地店铺，或是开办工厂，都属中小型。60年代中期以后的地产热潮和航运机遇，造就出李嘉诚、包玉刚等为代表的地产航运业巨子，再通过80年代初期的收购战，短短二、三十年时间迅速崛起。这是香港特有的一种发展现象，完全不同于以大银行或跨国公司为核心的英人经济。

第二，华人经济以家族色彩浓厚的企业经营方式见长。香港是一个发达的工商业社会，但华人经济都是家族性财团，保留浓厚东方家族经营色彩。

第三，华人经济同国际资本联系密切并加速向海外发展。华人经济同国际资本既合作，也有竞争，如包玉刚与汇丰银行的关系，以及同怡和争夺九龙仓。80年代后期开始，华资公开向海外进行巨额投资。例如1988年，李嘉诚等与加拿大商人合组财团，以32亿港元的资本，购得温哥华1986年世界博览会旧址地皮。第二年，新世界集团斥资12.2亿港元在泰国建立商业中心。

第四，华人经济近年来积极发展同中国的经济合作。到1988年6月，香港资本直接投资中国内地约43亿美元，其中华资估计达80—90%。巨额投资使得香港制造业大量转移到珠江三角洲地区。90年代初，香港（主要是华资）在广东等地设厂达2.5万家，雇佣500万从业人员，形成“前店后厂”格局。从而为香港产业结构向资本、技术密集型转移创造了条件，并与大陆形成多元化的合作新关系，迎接新世纪的挑战。

[本文作者李一平，厦门大学历史系讲师，厦门361005]

（责任编辑：沈永兴）